

# 两位俄罗斯汉学家的师生情

谷羽



老师阿里克(左二)与学生叶茨基(左三)合影

俄罗斯有位汉学家,译著有《聊斋》《唐诗》以及《中国文学论集》两卷本;郭沫若佩服他学识渊博,尊称他为“阿翰林”,这一称呼得到俄罗斯汉学界同仁的赞赏,这位汉学家就是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汉语名叫阿里克,他也是当今公认的20世纪俄罗斯汉学学派的奠基人。有意思的是,阿里克跟他的得意弟子尤·康·叶茨基(1897—1938)相处多年,十分投缘,因此两人称兄道弟,有诗为证:

刮脸腮如猴,目小利似锋。  
落拓休兄者,方敢摘篱洪。  
这首模仿汉语五言诗的绝句,就是老师阿里克写给弟子叶茨基的:第一句调侃叶茨基不修边幅,平日邋遢,胡须满面;第二句开玩笑,戏说弟子眼睛细小,却炯炯有神,目光锐利;第三句透露出自己与弟子称兄道弟,足见师生关系之随和亲密;第四句赞许叶茨基翻译研究葛洪的《抱朴子》取得成果,老师为弟子感到自豪。

这位叶茨基多才多艺,能写诗,能谱曲,还能画画、篆刻,更是个语言天才,掌握了十多门语言;1923年出版的《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就是由他翻译的一本中国唐诗选集。老师阿里克为这本诗集撰写了序言,提出翻译中国古诗的原则:注重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方法,科学性强调忠实于原作,艺术性侧重兼顾作品的音韵节奏和音乐性。

在老师阿里克的指点下,叶茨基经过多年努力,把深奥的中国典籍《易经》翻译成俄语版本。《中国典籍(易经)语文学研究及翻译的经验》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导师阿里克对这位弟子赞赏有加。

阿里克不仅为叶茨基写诗,还为他撰写过一篇小传,题为《楚生》。他给弟子起的汉语名字为“楚紫气”,看来师生二人对中国的“楚文化”均有浓厚的兴趣,“叶茨基”和“楚紫气”在语音上也有近似之处。阿里克为弟子撰写的小传,通篇模仿蒲松龄的聊斋

笔法。几经推敲,我尝试用汉语翻译如下:

楚生呱呱坠地浑身披毛,若毛发缠绕之肉团……母付诞下怪物。适有和尚路过,见后龇牙道:“汝子将为僧人弟子。”母稍安。

楚生秉性怪异。弱冠之年造一巨弓,弓弦长过两丈,狂拉弓弦,如拉琴弦焉。庭院中犬吠,有乌鸦飞来应和鸣叫。

稍长,楚生无师自通擅写汉字。一次归家,抓起木棍缠绕布条作笔,挥洒书写:瞬间,天棚、四壁,处处布满笔迹。滴滴答答!灵感之水珠淋漓落地。

楚生善雕刻。从鞋匠处借刀一柄,在无情之木上雕凿……咔嚓有声……围观者闻之,怯于近前。惧楚之孔武有力也。一日楚生为仙人雕像。如做三层馅饼,眼馋者,欲品尝却不得,莫名其妙。楚把刀扎向最后一层,左右晃动,忽有目光射出。众皆惊愕不已。

楚生喜读书,博览强记,善诠释。然偶或发狂,口中念念有词,奔跑如风,手舞足蹈,自言自语,如风怒号,听者关注,不



叶茨基为阿里克雕刻的藏书票



## 满庭芳

第五三五四期

听者如风过耳。楚生反复解释:墨池、钟表、刀剪、绿宝石,皆属阴;而伊萨基教堂、克朗施塔德、亚历山大利亚等建筑,皆为礼。听者惊奇。莫敢斥责,因楚生有证据能自圆其说。

楚生信奉蓝袜教。常目光发狂,着蓝袜,默念咒语。邻有女,其蓝袜丢失日久。一日邻人偶闻楚生房中蓝袜呜呜作响,大惊,遂告官。官差剪破蓝袜,押走楚生,生百般辩解,无用。于是楚生用漆工毛刷于粉墙上作诗曰:“蓝天蓝如碧,深邃默不语。楚生人清白,害他是鬼域。”

官闻之大惊:因其亦信奉蓝袜教,路人皆怒目而视。遂放楚生还。

笔者附言:蓝仙、蓝袜、蓝天,皆集于楚生一身!降生身披毛发!见过麒麟者,知楚生出世之奥秘。汝等幸存者!闻之毛骨悚然!

从这篇小传足可看出,作为老师的瓦西里·阿列克谢耶夫,跟他的弟子叶茨基关系十分密切,令人称赞。

叶茨基感恩老师的栽培,曾为老师雕刻了一枚藏书票,阿里克珍藏使用了多年。这枚藏书票下边有两个俄文词语,意思是“阿列克谢耶夫收藏”。中间刻一书生像,背着行囊,用木棍挑着一摞书,似乎沿山路向上攀登,有个小精灵似的娃娃在为他指引道路。揣测其含意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上面三个汉字从右往左读:不温斋,出自《论语·学而》首段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枚小小的藏书票,足见弟子对师长怀有的无限敬意与深情。

时光悠悠,如今,这枚藏书票已成为中俄文化交流的珍贵见证。我有好几本俄文书加盖了这枚藏书票印章,分别是阿里克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汉学家孟列夫和李福清院士赠送给我的图书。其中有阿列克谢耶夫翻译的蒲松龄《聊斋小说选》《中国古代散文精粹(两卷)》《司空图“诗品”翻译与研究》,还有阿列克谢耶夫与叶茨基合作编选的《七至九世纪中国抒情诗选》。这几本书都是我藏书中的精品。阿列克谢耶夫1951年去世,至今已74年;叶茨基1938年去世,至今已87年。两位俄罗斯汉学家的著作仍世代流传,再一次说明:书比人寿命更长久。学者的著作是他们生命的延续。这样的学者令人敬重,让人怀念。

2025年5月19日北京时间近午时分,客居新西兰的我收到南开大学文学院张铁荣教授发来的微信:“李剑国先生一个多小时前辞世,倒在研究室的地上。”突如其来,慌不择句,我当即回复:“惊天霹雳,哭剑国……”

这几年,陆续得知一些师友远行的消息,心中的悲戚、怅惘可想而知。但剑国的猝逝,却让我心理上更受震动和冲击。因为太突然了,我一直认为他身体还算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太熟悉了,难以相信他竟然会先行。

1979年秋,剑国与我等九人,一起入学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连同早半年入学的1978级研究生陈洪等七位同学,三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同吃职工食堂,同住十宿舍,几乎天天生活在一起。剑国与我所住的不是一个房间,但都在走廊尽头,又门对门,几近同室。我俩专业不同,但曾一起在系办和系主任郝世峰先生家,拜见国内外的许多著名学者;一起坐在主楼教室里,听外文系老师讲日语课;一起大早晨站在校内小花园里,为等候上课或参加其他活动各自咬大饼。他从沈阳考到南开,本身是山西人,他说过的话我印象极深的一句是“最好吃的菜就是土豆”。

1982年夏,1979级的剑国及我等四人毕业留本系任教,连同稍早留系的1978级陈洪等两位同学,我们又成了同事,亲密关系毋庸赘言。上世纪90年代以降,剑国与我所住的学校西南村家属楼,仅步行两分钟的距离,于是有段时间,他三天两头傍晚时分到我的住处,吸烟、喝茶,山南海北聊大天。剑国曾眉飞色舞地对我讲,《魂斗罗》游戏太好玩了。果不其然,一次我大清早到他家,他开门时手里竟拿着游戏机手柄,让我不禁笑出声来。我俩还曾不止一次地一起骑自行车到天津商学院(即今天津商业大学),找在那里任教的研究生同学打麻将,每次都是剑国撺掇,瘾头不逊打游戏。点点滴滴,细故毛举,深情厚谊,永难忘怀。

玩归玩,剑国可是地地道道的学者。从年龄上看,剑国仅长我半年,但论做学问,我却难以望其项背。他在读研期间便有著作《诗苑漫步》出版;之后,更出版了《唐前志怪小说史》《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唐五代传奇集》《宋代传奇集》等近二十种著作,在小说研究、古籍辑校、文化史研究诸方面著作等身,影响深远,并多次荣获全国高校及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各种奖项,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生”。哪怕写小文章,剑国的文字功力也常令人叹服,在相关领域和南开中文系可谓有口皆碑。成就必然浸透着心血。剑国曾因视网膜眼病,视力欠佳,但他做学问仍然是青灯黄卷,琢肾雕肝。人们经常见到的是,剑国从新开湖对面的老图书馆出来,提着沉重的一大包书的身影,由此可以想见他背后付出的努力。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曾批评我在业务上仅凭兴致,用心不专:“你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哪行?”挚友诤言,极为难得,使我感愧交并,会记一辈子。

我2014年回国,曾与陈洪、乔以钢、李剑国、陶慕宁、张铁荣、王立新、沈立



刘大枫

## 德业长昭忆剑国



岩诸位教授聚会。2018年再回国,则惜乎未遇剑国,他这个山西人,据闻去内蒙古办事;而蒙古族的北京人老陶(陶慕宁),又去了山西。此事凑巧,有点戏剧性,但也意味着白云苍狗,步入老迈之年,厮守已非易事。于今睽隔万里,我想剑国年逾八秩,桑榆暮景,该放松一下了,玩玩游戏,打打麻将,孰料他竟还在为做学问而孜孜矻矻。剑国除了患有眼疾,还有一次生病我记得很清楚,他小女儿突然来敲我房门,告“刘叔叔,我爸病了”,我随之急往看望。在我印象中,他面目清癯,精神矍铄,身体状况大致还不错,孰料天不假年,现竟遽然离去。我与剑国2014年的那一次相聚竟成最后一面。

铁荣在微信中说剑国,“一生热爱学术,最后倒在研究室的地上,也算是一个教师和研究者的最佳选择。好在本人最后没受什么罪”。呜呼!剑国以学术了身达命,真是让人既感到如此无愧人生,可稍得宽慰;也痛惜不已,仰天唏嘘啊!

哲人其萎,德业长昭,含悲属字,追忆剑国。李剑国教授永存。

题图:李剑国教授生前照片及学术代表作

是指内塑像11面观音。独乐寺密码揭示了这座建筑的恢宏和精致,正如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对独乐寺所作的评价:“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中国建筑蜕变之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独乐寺密码来自刘成碑,它的去向已经成为一个谜。朱彝尊《日下旧闻考》中对独乐寺刘成碑的记载,引用的是清朝康熙年间智朴所著《盘山志》,但在朱彝尊校订的《盘山志》中并没有发现对刘成碑的记载,可能他在校订时删去了。但无论如何,至少说明在清朝康熙年间这块碑还立在独乐寺院中。至乾隆年间,在描写蓟州的诗文中已经看不到刘成碑踪影了,只是乾隆皇帝在他的《寄题独乐寺》一诗中有一句:“禅心远遂穿云磬,古迹空传没字碑”。这里的没字碑可能就是刘成碑,因为风化严重,字迹已经很模糊了。从此以后的文献中再无提到刘成碑。再者,清朝乾隆、光绪年间都曾维修过独乐寺,而且乾隆年间还在独乐寺东侧建起了行宫,有人怀疑是不是在两次维修的过程中,将已成为无字碑的刘成碑砌进了乾隆行宫,或是砌进了寺后的古井中。独乐寺密码已成千古之谜。(题图摄影:罗丹)

## 独乐寺密码

金学钧



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音菩萨像”的记载,暗藏了独乐寺的密码:258111,这组数字就像独乐寺观音阁暗层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2是指独乐寺观音阁从外面看是两层,为木结构阁楼式建筑,中间还夹一个暗层;5是指独乐寺观音阁一层自东向西由6根巨大的柱子和横梁所构建,一共有5间;8是指一层内部南北共有8架梁柱,撑起阁内宽广的空间;1是指大阁一座,就是观音阁的整体建筑;11



天津的近代建筑融合了中西方建筑艺术,呈现出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其中,小洋楼因在外观设计、功能布局和装饰艺术上融合了西洋韵味和本土风情,从而成为天津建筑文化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符号。小洋楼的出现是天津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当近代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之后,西方文化通过各通商口岸传入中国,地处京畿的天津成为中西方异质文化交汇的落脚点,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和比利时等国在天津设立租界,因而在天津留下了风格各异的小洋楼,小洋楼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汇入了这些城市的内在精神中。

小洋楼文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建筑文化现象,指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外国人在中国建造的住宅建筑,它们融合了西方的建筑风格和东方的居住习惯,形成中西合璧的建筑风貌,在

天津、上海等城市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学者李永东在《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一书中提出观点,认为小洋楼文化是一种具有“商业性、现代化、都市化、市民化”的中西杂糅的文化形态,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海派文化、都市文化既有着一定联系,又有着明显区别的一种新型文化”。

小洋楼文化对近现代天津城市空间影响颇为明显。美国记者约翰·赫西(John Hersey 1914—1993),在天津出生、长大,多年后他回忆道:“我长大的地方是一座多么怪异的城市啊,只需要三四个中国铜板,我就能乘黄包车,从我英国的家到达意大利、德国、日本或比利时。我去法国上小提琴课,跨过河就能到俄国。我经常去俄国,因为那儿有一座带湖的美丽的森林公园。”这些体现不同国家文化的小洋楼建筑,在天津这块土地上构成了相对统一的城市空间,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小洋楼文化。

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六)

## 小洋楼:天津文化精神的时空记忆

李进超

小洋楼是展示西方近代文明的窗口,客观上促进了天津近代文明的发展,对天津近代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天津学者谭汝为认为,“西方文化思潮一方面和固有的中华传统文化发生撞击;另一方面在华洋杂处、中西交流之中,二者又有交融。在近代中国北方,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得领世界风气之先。由于中西文化在天津的撞击与融合,使得具有开放思维和现代意识的广大市民阶层得以涌现,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奠定了根基。天津市民那种竞争意

识、生活理念和价值追求、较为规范的社会交往和社会组织,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水平的提升”。以作为“他者”的西方文化为鉴,天津城市文化更加彰显了自身特点,在传统文化品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塑造出进步开放、兼容并蓄的城市精神。城市精神是在历史漫长的时间轴线上逐渐形成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出现了九国租界,以英、法、德、美等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在与天津本土文化的交锋中,产生激烈的碰撞与深广的融合。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与参与下,天津在很多方面都开近代中国风气之先。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小洋楼及其附近街区以各种空间形式存留下来,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经历了时间洗礼的新旧城市空间,也彰显了这座城市的

内在文化和人文精神。小洋楼文化承载了天津城市精神的时空记忆,成为许多天津作家创作的灵感源泉。赵玫的小说《朗园》就将现实的城市空间与虚拟的文学空间相对照,顺着城市历史的时间线索,呈现出属于城市精神的时间与空间记忆。小说以“朗园”这个地点来命名,将故事情节与矛盾冲突围绕着一个空间而展开。从时间的轴线来看,殖民地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文革”中,朗园分别住着代表不同阶层的不同身份的人。以朗园这个私人空间为中心,小说又辐射出殖民地时期的维多利亚花园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翊堡大饭店这样的公共空间。朗园见证了这座城市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其命运也随之起伏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变,古旧的朗园成为消失的历史,其所在的空间被新的高楼大厦所取代。在小说中出现的很多具体的天津城市空间,有些一直存在,有些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改变或消失。在这里,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形成了一种戏剧化的叠合,用一种可感知的形态具化了城市的文化和精神脉络。



沽上丛话